

思想自由史

「英」柏圖·著 / 岳麓書社



思想自由史

[英] 柏雷·著/罗家伦·译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伍国庆
封面设计 许康铭

思想自由史

〔英〕柏雷 著
罗家伦 译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50,000 印张：7 印数：1—2,500

ISBN 7—80520—110—2

K·30 定价：1.75 元

〔湘岳88—5—1〕

《凤凰丛书》总序

俗说凤凰不死，
死后又还会再生。

——沈从文

这套小书取名《凤凰丛书》，因为凤凰和龙一样，都是中国观念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龙被捧得太神圣了，颇有点吓人，不是随便好搬弄的。凤凰则从来没有被赋予那么高大的权威和政治意义，使人觉得可爱多于可敬，和这套小书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比较合拍。

《凤凰丛书》专刊旧籍，不收新作，内容主要是：

一、有文化积累意义或学术艺文参考价值的一九一一至四九年间的旧籍。

一、海内外关于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和记述，当然也包括近现代人物的传记。

一、可以称为文史资料的海内外报刊、文集的辑录和汇编。

一、文化史、自然史、民俗学、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

《凤凰丛书》的宗旨是宽容。入选之书，着重在史的价值和文的趣味，不一定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立场，不必要都打上五爪金龙的印记。

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凤凰”(Phoenix)，活满五百岁时，聚香木以自焚，从火中而新生。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人们就不会愿意它永远死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也是如此。

《凤凰丛书》切盼得到大家的帮助，欢迎大家提供选题，参加编辑，使它能活得稍微长久一点。伊斯兰神话中的“西摩尔格”，也是一种华丽的神鸟，“上帝把它创造得十全十美，但后来它变成祸害并被杀死”(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但愿我们的凤凰的命运会比它好。

丛书主编：钟叔河

编辑：鄢 琨

1986.5.20

目 录

-
- 译 言……………(1)
- 著者小传……………(8)
-
- 第一章 导言 (思想自由及其反对方面的势力)
……………(12)
- 第二章 理性自由时代 (希腊与罗马)……………(23)
- 第三章 理性入狱时代 (中古时代)……………(46)
- 第四章 解放的先声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62)
- 第五章 宗教的容忍……………(80)
- 第六章 唯理主义之发展 (十七与十八世纪)……………(109)
- 第七章 唯理主义之进步 (十九世纪)……………(149)
- 第八章 主张思想自由的理由……………(194)
-
- 参考书目表……………(209)
-
- 后 记 (伍国庆)……………(213)
-

这部最简括的名著，述二千余年来西洋理性与权威之争——也就是述哲学，特别是科学与宗教之争；于不多的篇幅之中，可以窥探西洋思想潮流演进的大概。它或者也可以称为《唯理观的西洋思想史》，然而思想史的名称太泛，决非谨严的史家如柏雷教授者所欲加于本书。本书的出发点是“自由思想”(free thought)，然而著者不称为《自由思想史》(History of Free-thought)，乃称为《思想自由史》(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想来也有理由。“自由思想”这个名词，相沿用以表示反抗基督教神学的唯理思想^①，而此书上及希腊罗马，远在基督教神学成立以前，并且讨论思想言论自由的基本原理，不

^①参看本书第一章。

是专为对待基督教神学的思想说法。况“十八世纪的自然神论”(The 18th Century Deism)常常得着“自由思想”的标帜^①，设把这本书名为《自由思想史》，不特范围和现在的有广狭的不同，恐怕还要夹入其他的联想。这个命名的意思，虽是根据译者所了解的，或者也是著者可以承认的。

关于这部书的译法，译者或者也当说几句话：

(一) 译者在其力量所及，务求忠于原文。然原文不但精密深刻，而且常有意在言外之处。其征引他人的，亦多系此类文体。译者于不敢损益中，力求其本意的显达。深惜多少好的“射他耳”(satire)与“意蕴里”(irony)[二者均系音译，虽与本音标准，不无微有出入处]，本来就很难转入第二文字的，更被译者的笨笔作践了。

(二) 对于许多非本名的名词，译时不问其通常之含义，而问其在本书中之所指。因为每个名词，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背景。对于本名的名词，则有照通俗所沿用的，也有自己斟酌变更的。

(三) 想懂得这书的本意，而谋执行(一)(二)两项，则决非仅读本书所能了事。著者在书后所列参考书表，极为精当；译者按其所指示者涉猎，得益非浅。望有志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的，不可忽略。

(四) 这本书因为想把须弥山放在芥子下面，所以极为收敛，假定读者曾知道许多事实的背景。这种假定，在欧洲受教

^① 参看 J. M. Baldwin,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Vol. 1, p. 396.

育阶级里，大概还通行得过去，若是移到文化和历史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自然沿途都是困难。所以译者不但须将许多事实和引证，加以注释，就是对于通常的历史人物，也要将他们的时地考明，免得读者的历史观念混乱。这样一办，于是多出几百条注释，其中有些是极麻烦而不易找到的。考证所根据的书籍，最重要的是：

1.《Encyclopædia Britannica》(11th Edition)。

2.《La Grande Encyclopédie》。

3.《Meyers Grosses Konversations Lexikon》(1903)。

4.《Herders Konversations Lexikon》。

5. James Hastings:《Encyclopæ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6. J. M. Baldwin:《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7. L. Stephen:《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8. Wetzer u Welte:《Kirchlexikon》(1891)。

9.《Encyclopædia Biblica》。

但是还有考不出来的，如第四章中 Macolano 的身世，即找《Nuova Enciclopedia Italiana》亦不可得，只能任其暂阙。并且为了这本书，译者将《旧约》与《新约》中重要各书，重读一遍。

凡前章有注解的，后章略去。凡一次注西文原名的，下次略去，但遇重要处或因有同姓者易起误解处（如 J.F. Stephen 及 Listie Stephen），则常重注原文。

关于注解，译者费了许多的时候和工作，望读者不责备他的琐碎而且读时不忽略过去，或者对于这书的了解，有点帮助。

译者动手译这本书，远在民国八年春间，当时将未完译稿，交北京《晨报》逐日发表，到第五章止。《晨报》鼓励这种译本的盛意，译者谨借这个机会谢谢。但是译到第五章的时候，他就因事中止了。九年在美，见几个著名的史学教授，如 J.H. Robinson 等，讲起西洋文明史来，都介绍学生读这本书，常说这是最好的一种著作，关于西洋思想潮流的大概的。于是他续译的心思复动。十年夏间，乃将第六和第七两章——最难的部分——译完；十一年夏间将第八章——最后的一章——译完。常想修改后寄回中国出版，而总没有时间。十四年在柏林，发愤动手修改前五章，不料他自己大不满意当日所译，结果将这五章完全译过。十五年在巴黎修改后三章，复多不满之处，将第六和第七两章大部分修改，而将第八章也重新改译。这就是目前这份稿子。当然里面还一定有可以使译者不安的地方，他现在不曾发现或觉着；只是将来一发现或觉着了，他一定虚心的再去改。他想对于学术的工作，不苟且而求自己心之所安是最重要的事。

这本小书原来的价值，在西洋早经估定，用不着此地再讲。不过译者觉得这本书传到中国来，却有两重特别的使命，像是要担负的。

第一、中国人对于自由，尤其是对于思想言论自由的态度，是消极的，放任的。我们的先贤，虽然在中国历史上造成许多光荣的例外，但是仔细观察起来，他们的牺牲，大概可以分为

两种：(一) 他们虽常因言论而遭祸，但是他们所遭受的，多半是其所发言论自然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有觉性的想为言论自由的主张去牺牲，以唤醒大家对于这件主张所应当觉得的价值。

(二) 如文字诸大狱，且把被罗织的除开，论到真正为文字获罪诸人，其所不惜身殉的乃是——至少其所着重的是——政治运动，而不是纯粹知识的主张。因为历来的注重不同，于是大家对于这种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原则，个个应当享受的权利，竟弃而不问，任他仰着权威的鼻息，朝生暮死。二十五年前严又陵先生译弥儿的《自由论》(后严先生改作《群己权界论》)。译稿失而复得，严先生以为或者是“天相中国”，将留此书以大有造。不意二十五年后中国的言论思想自由在内部虽然发酵，而在外面所受的摧残，恐怕还远过当日。更不意现在争废止《出版法》和《治安警察法》的人，虽然他们的举动我根本佩服，并不曾用力发挥思想言论自由的原则之精义，以折服国人，只是以刻板文章，说是西洋各国如此则我们也当如此。这或者是弥儿的说理，太深刻而太重抽象，且于历史的具体事迹太略；或者是严先生的译笔太高古。二者合在一起，致减少该书在中国所应当发生的影响。但是对于这层，弥儿与严复所负的责任，万不及一般中国人事事不愿意探求基本原理所负的责任。译者私有的意见，以为中国民族如果要为学术和他种主张挣扎出一种独立不挠的精神，纵不能产生几个为纯粹知识的意见而烧死的Bruno，也当产生几个不怕终年向法庭和监狱讨生活，致自己的地位和身家于不顾，而专以唤醒国人对于思想言论自由的觉性的Bradlaugh。凡是外面压力的侵入，都是乘着内部的弱点。设如

不把这种自由的原则，深深的贯入一般人脑中，凝成钻石似的晶体，以对抗外面的锤凿，则几种纸上条文的兴废，与自由本身的保障毫不相关。以上这番话，仅为对待外面有形的权威而说；至于解除思想内部束缚理性的权威，也是思想进步的程序中一件极重要的事。关于这层，本书的篇幅虽然有限，但是其所提明的筋络和列举的先型，也不无可以使读者兴奋而且能够遵循的地方。

第二、宗教的问题——尤其是基督教的问题——现在已经是一个沸腾的问题，在国内一般人的觉性上烧着。这是一个很有意识的问题，于中国一切学术、思想、政治、社会发展的前途，关系甚大。要得着这问题适应的解决，译者认为只有向西洋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史——去借鉴。以基督教为例，关于其教义的真伪，自当悉心研究十九世纪的《圣经》批评，和十八世纪自然神教者、无神教者各派的学说。至于研究其在学术、思想、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自然当审察它在西洋历史上的前因后果。譬如，在基督教以前，我们当研究希腊的哲学科学，为什么能那般自由的发展？中古时代为什么大家都变成一种“潜龙有悔”、“遁世无闷”的情形？近代科学的萌芽，为什么迭受挫折；不是得着一般不避艰险的先烈，能为真理牺牲，则不知今日是否还有这个硕果？为什么到一九二五年，中国人称为先进国的北美合众国南部，有几州还以州议会的立法，禁止州立学校教授进化论？为什么有惊动一世的“猴审”，使Tennessee州的Dayton得“猴乡”(Monkeyville)的雅号？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文明国家，曾任国务总理的W.J.Bryant，天天还用政治

和经济的势力，到处去阻止生物科学的发展，扬言“达尔文可以使你们的祖宗变猴子，不能使我的祖宗变猴子”？这些冷酷的事实，是正待虚心研究的。所以拥护宗教和反对宗教的人，无需专尚意气之争，且请“回到事实”。近来国内反教拥教的团体，似乎风起云涌。但是从实际上考察起来，只是下了一阵不经氢氧二气凝合成点的“宣言雨”。译者深知“纸质霰霰弹”是历来中国专利的武器发明，但是两方用了，都不见得于敌人有害，这或者也是宋襄公仁义为怀的意思。实际上要攻击某项宗教的人，首先应当知道某项宗教在历史上确切的罪状。拥护某项宗教的人，更应当知道他的宗教在历史上所演出的经过，庶几可以免蹈许多前人愚妄的覆辙；更可以釜底抽薪，免除许多人类的惨剧，撤消许多进步的障碍；这或者也不悖宗教家博爱之心。果然两方面都能向这条不是迷失的路上走，则这本简洁的著述，很谦卑的或者可以做一块敲门砖儿。

能为纯粹的知识的主张而殉，是人类最光荣、最高尚不过的事。能自己为思想言论自由作有觉性的牺牲，以唤起他人对于此事的觉性，是对于社会最有实利的贡献。研究事实，从事实上抽得基本原理而铸成的深信，才是真的深信。温度极高而没有水分的空气，在这永不停息的社会机械里，不但无用，而且处处发生危险，最能改变未来途径的，莫过于已往的经验。历史上的错路，可以重走一遍，要是人忽略了他的教训。

罗家伦

民国十五年四月，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 著者小传

在英国——不然，在说英文的国家——里，柏雷教授可以算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若是我们小心一点，避免“最大的”这个名词。这是一般历史学的史家所能公认的。除了他自己多少可靠而真有贡献的著作而外，他继承Lord Acton在剑桥大学皇家设立的近代史教授的讲座，——这是英国史学界最重要的地位；——伟大的《剑桥大学中古史》是他计划的，同样伟大的《剑桥大学上古史》是他领袖编辑的。（两书尚继续在出版）。很少史家的学问有他这样渊博，很少史家的思想有他这样深刻。John Bagnell Bury于1816年生于爱尔兰Chogher。最奇怪的是他生于宗教势力甚盛的地方，而他的父亲Rev. E. J. Bury，是一位牧师。他的大学教育，是在爱尔兰首都德柏林大学的三清学院（Trinity College）受的，给了他一个硕士的学位。1885年

被举为该大学Fellow（这是英国大学里的一种特别制度。Fellow可以说是大学里一种研究的教员，有时授课，有时并不授课。对于造就学者，这种制度最善），直至1893年止。自1893至1902年为德柏林大学近代史教授；1898至1899年间，复被推为皇家所设希腊文教授，因为他的希腊文是极好的。1902年Lord Acton死了，柏雷被选继任他的剑桥大学皇家所设近代史教授讲座。这个讲座，有极光荣的历史，为著名的史学家如Freeman, Seeley, Acton先后所占领。而且Lord Acton是以博学名震全欧的人；他死了，一旦剑桥大学选柏雷继任，自然是学术界一件很重要的事。柏雷所受的学术荣誉不少；他是British Academy的会员，Oxford, Durham, Dublin等大学的名誉文学博士，Edinburgh, Glasgow, Aberdeen等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但是这种外来的荣誉，当然不能表现柏雷本身的价值。他本身的价值，全在他精确浩瀚的著作里。他的希腊史学，是当代少有的权威。他所著的《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G.P. Gooch认为是最精当而能将范围广博的新材料，指挥如意的著作，为Grote以后希腊史中重要而且有用的出品^①。柏雷关于Byzantine研究的著作，无处不是渊博学问的表现。这些著作，和他所校订的吉朋《罗马衰亡史》（Gibbon's《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把他放在近代史学界中，最前的地位^②。

①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484. Gooch也是当代英国史学界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② 前书, P. 494.

他的著作极多，在此不能尽列，也不必尽列。现在只是把重要而成本的书籍，以年代的次序，列入以下简约的表中。

所著的书籍：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1889)。

«Student's History of Roman Empire from Augustus to Marcus Aurelius» (1893)。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1900)。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augural Lecture) (1903)。

«Life of St. Patrick and His Place in History» (1905)。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Harvard Lectures) (1908)。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Late Roman Empire» (Creighton Memorial Lecture) (1909)。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Ninth Century» (1911)。

«Romances of Chivalry on Greek Soil» (Romanes Lectures) (1911)。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802~867) (1912)。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1913)。

《The Idea of Progress》(1920)。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395~565)
(2 vols. , 1922)。

所校订的书籍：

Pindar's《Nemean Odes》(1890)。

Pindar's《Isthmian Odes》(1892)。

Freeman's《History of Federal Governments of
Greece and Italy》(1893)。

Gibbon's《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s. I and II, 1896; Vols, III and IV, 1897; Vols. V
and VI, 1898; Vols. VII, 1900)。

《Byzantine Texts》(4 Vols, 1898~1902)。

Freeman's《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1903)。

所计划、编纂及参加之书籍：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Edited by J. B. Bury.
S. A. Cook and F. E. Adcock (in Continuatio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Planned by J. B.
Bury, Edited by H. M. Gwatkin and J. P. Whitney (in
Continuation)。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Planned by Lord Acton,
Contributed by Bury and Many Others.